

让脱贫的农民演自己的脱贫故事

《一个不落》：一场人民文艺的可贵实践

新华社厦门电(记者任沁沁、张逸之、吴剑锋)两年，一头扎进农村，与农民吃住一起，让刚刚脱贫的农民演他们的脱贫故事。导演郭啸这场大胆实验，结果如何？

11月25日，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国产电影展开幕式上，1972年出生的郭啸，作为导演代表上台致辞。他的这部由脱贫农民本色主演的真实脱贫故事片《一个不落》，将在本届电影节展映。

“这是一次人民文艺的可贵实践。”1972年出生的郭啸告诉新华社记者，艺术源自生活，人民需要艺术，更需要来自真实、能与他们血脉相通的艺术。

影片中的梨花村，原型是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上司乡岭头村，这里曾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贫困村。驻村扶贫工作队改变了村民的命运，武乡羊肥小米品牌创立了，微商销售模式搭建了，曾经滞销的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了，光伏项目立起来了，岭头村在2016年实现了整村脱贫。

2017年春节，郭啸第一次来岭头村采风，决定把这里的故事搬上大屏幕。那些历经

了沧桑依然挂着笑的高原红的脸，长满了老茧却温暖无比的有力的手，言语间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向往，都触动着他。

不需要布置场景，土黄色的土地、搪瓷大碗、简陋的窑洞、砖墙、石壁与石桌，就是最好的景。不需挑选演员，精准扶贫政策下脱贫的农民，就是最好的演员，他们的真实演绎最具话语权。

扎根数月，写好剧本，当年5月1日，《一个不落》开机。

影片以返乡青年张帆的视角，讲述了驻村扶贫帮扶工作队进入梨花村后，依靠党员、群众解决土地遗留问题、家族矛盾；通过精准扶贫，带领梨花村成功脱贫的故事。电影礼赞扶贫工作队员干部，更真切呈现了贫困农村的自然风貌、社会地理、农民生存状态以及情感诉求。为了让连相机都没见过的农民对摄像机不发怵，郭啸从不喊“开机”，总是在与农民聊天的轻松氛围下渐入拍摄佳境。为了拍摄过程中不打扰农民表演，剧组没请副摄影师。

在自己最熟悉的天地里，农民们每天拿到一张台词，在规定的情景内，“可劲儿折

腾”。演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都很投入，没人跳戏。

台词对农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想到，农民们每天领到台词后，不仅能背下来，还能对台词做合理改变，融入了当地的语言特色。“抿圪斗”“拉拉话”“不歪”“牛哄哄”“瞎胡球闹”等真实生活中“流”出来的语言，让影片接上地气，还冒着热气。

不少当地农民主动要求入戏。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拄着拐杖来找郭啸，“村里其他人都份上了，给我也加个角色吧。”

从村干部腐败、懒汉混吃混喝、兄弟反目、孩子交不起学费；到扶贫干部进村，与农民倾心交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确立精准扶贫政策。而后，村干部积极配合工作队做好脱贫致富工作，光棍李二狗入了村里新成立的农民经济合作社、光棍狗蛋成了乡村快递员，上不起大学的孩子工作队给联系了爱心企业，村庄各种乱象得到了改善，乡风民风村容村貌向好……走上脱贫致富大道的梨花村，正是千千万万个脱贫村的真实写照。

“精准扶贫让俺们村告别了穷日子，过上了

好日子，还让俺们当了回电影演员。”剧中扮演老支书的岭头村73岁村民张来旺深情地说，俺们感觉日子越过越好，往后更有奔头。

2018年10月，《一个不落》在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首映；2019年，影片被推选为2019年度国家电影精品工程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20年10月17日第7个国家扶贫日前夕，《一个不落》登上大银幕。

电影上映以来，郭啸接到了许多农民朋友来电。他们感谢剧组拍了一部让农民感到亲切并为之感动的电影。郭啸说：“这是一部由人民参与创作，为人民抒怀的电影，是我应该感谢你们，人民的喝彩才是艺术存在的根本价值。”

随着贵州省日前宣布剩余的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与其说这部电影的拍摄是一场实验，不如说是我们抓住了变革时代赋予的机遇。”郭啸说，这是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最好时代，电影人应当忠于时代，以光影讲述更多观照现实、映照民心、推动进步的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夺冠》等多部主旋律电影在厦门举行的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者表彰仪式上获得表彰。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主旋律”正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

主旋律电影有多火？票房表现可见一斑。2017年，《战狼2》以56.8亿元票房横空出世，坐稳国产电影票房总榜榜首的位置；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大主旋律商业大片同台竞技，一举刷新多项票房和观影纪录。

时间进入2020年，疫情急剧冷冻电影产业的背景下，依然是主旋律电影上演了“冬天里的一把火”——《我和我的家乡》《八佰》两部影片开启逆势突围，联手献上约60亿元票房，引领中国电影市场成为全球第一票仓。

《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杂志主编皇甫宣川更愿意称这些主旋律影片为新主流影片，它们不仅具备了主流价值、主流意识等属性，更囊括了受众认同、大众审美、市场认可等符合现代电影观念的文化内涵和产业属性。

在商业化电影占据市场主流的今天，主旋律电影何以摆脱传统的窠臼，夺取票房和口碑的“双赢”？

在导演刘潇看来，相较以往，近年来上映的主旋律电影主题明确、人物设定精准，无论故事结构还是叙事方法都具备成熟商业电影的框架。

“以《涓天河行动》为例，影片围绕营救这一主线，每个人物都为此服务，节奏合理，故事清晰。”他认为，这是我国主旋律电影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不少主旋律电影都将叙事视角从英雄转向平凡人。《八佰》中，一个个小人物成为推动故事进展的主角；而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时代发展与国家巨变映照在平凡人的悲欢离合中，让人为之动容。

“任何一部优秀的电影，要想吸引观众，就要引起他们的情感，角色必须是个活生生的人，有爱有恨有恐惧。早年主旋律电影塑造英雄人物，往往对缺点避而不谈，导致人物失真。”刘潇说，而近年来上映的《红海行动》等影片，更加注重呈现人物身上的瑕疵与成长，无形中拉近与观众间的距离。

“只有创作者在情感上与民众的情感能形成共鸣，才有可能创作出反映当代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的作品。”皇甫宣川说。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不再拘泥于革命历

史题材，草根故事挖掘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在青年导演韩一看来，主旋律电影大热背后，是越来越多专业化程度高的创作团队加入其中，以更具深度和宽容度的角度去讲述时代的大主题。“例如影片《一点就到家》，通过几个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创业的故事，透视社会变化，它既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也可以被视为喜剧电影。”

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正在上演的真实故事，亿万人民生活奋斗的火热图景，为广大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现实沃土、灵感源泉。

由脱贫农民本色主演的真实脱贫故事片《一个不落》，在本届金鸡奖活动中展映。“与其说这部电影的拍摄是一场实验，不如说是我们抓住了变革时代赋予的机遇。”该片导演郭啸说，这是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最好时代，电影人

应当忠于时代，以光影讲述更多观照现实、映照民心、推动进步的故事。

《夺冠》取材自中国女排的真实经历，一经上映便引发了观众对主旋律叙事的全新认识。凭借该片获得最佳编剧提名的青年编剧张冀说，主旋律大片，需要真实、本土、充满烟火气的，区别于好莱坞或者其他国家形式的中国叙事。

创新，也是当前主旋律电影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从《涓天河行动》到《红海行动》的一系列军事片、战争片的探索，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对电影新形态的尝试，从《中国机长》到《夺冠》等影片在价值观上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取舍……它们的成功，无不是创新意识下艺术实践的结果。

“真正做成高质量、符合时代的审美需要的主旋律精品，需要不断创新，寻找多样化的



▲ 11月28日，电影《夺冠》获得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河南洛阳发现 2600

多年前戎人王级大墓



发掘现场，阳徐阳墓地，标号为M15的墓葬。考古专家和学者在查看洛

新华社郑州11月29日电(记者桂娟、史林静)天子脚下，为何会有外族久居；中原腹地，怎会出现西北戎人特有的“头蹄葬”；史书中记载的陆浑戎到底在哪？近日，一座春秋时期西北戎人的王级大墓在河南洛阳徐阳墓地被发现，进一步印证了2600多年前陆浑戎迁徙、融合的历史，对探索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融合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吴业恒介绍，这座标号为M15的墓保存完好，随葬器物主要有饕餮纹铜编钟、编磬、玉璜、玉扳指等，且墓葬周围分布有陪葬车马坑。“车马坑陪葬对应的是高等级贵族墓葬，另外，从出土的编钟、编磬等青铜礼器来看，应该是一座王级大墓。”吴业恒说，这也是徐阳墓地考古发掘的第二座王级大墓。

从随葬品和葬式葬制来看，15号墓与该区域出土的其他墓葬一致。“墓内随葬器物以及在车马坑内放置马牛羊头蹄的殉牲习俗，与春秋时期西北戎人的文化面貌、埋葬习俗相同。但随葬铜礼器、车马规制等又显示其受到同时期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史家珍说。

“15号墓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说，墓葬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折射，15号墓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体现了中华文明有容乃大，是中华文化五千年兼收并蓄民族融合的实证。徐阳墓地处于洛阳市伊川县徐阳村，是2600多年前从中国西北迁往洛阳伊川的陆浑戎墓葬群，也是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首个戎人遗存。根据史书记载，陆浑戎自公元前638年迁入洛阳伊川，公元前525年被灭。

徐阳墓地自2013年发掘至今，共清理墓葬150座，其中大中型墓12座，大中型墓葬均有与之对应的陪葬车马坑或马牛羊头蹄祭祀坑。“除了一些马牛羊头蹄等戎人祭祀的特征外，该墓葬群还出土了中原地区较为罕见的单耳罐陶器以及螺旋形金耳环和鎏金铜质挂件，这些都是典型的戎人习俗和装饰。”西北大学教授罗丰说。

“无论从时间、地域，还是规模、习俗上看，徐阳墓地都与春秋时期活跃在这一区域的陆浑戎对应。”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说，这是研究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

“不过随于时代，反处处合于时代”

看京剧“第一科班”如何守正创新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白瀛、何凡)1959年，富连成社弟子袁世海在表演京剧《龙凤呈祥》时，将《芦花荡》一折中张飞出场的三倒步改成了三望：一望前面还有多远，二望敌人来了没有，三望周围的情况；之后又采用了范宝亭《演火棍》焦赞的边挂，来了个反飞脚。与之合作的梅兰芳称赞“他这出戏，短小、精悍、巧”。

“张飞的出场表演经过了袁世海的巧妙设计，演起来干脆利落，即表现出张飞的快人快性，又透露出他的稳重沉着。”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学者张雯睿说，这个惊艳的出场背后是袁世海对程式的巧妙应用和他严谨、规范的基本功。

日前在京举办的首届“富连成戏曲国际青年学者论坛”上，不少学者和专家认为，富连成社的发展历程，对于当下戏曲的“守正创新”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作为京剧“第一科班”，北京富连成戏剧学社成立于1904年，在开办的44年中先后培养了八科近800人，其中不乏马连良、于连泉、叶盛兰、袁世海、谭元寿、梅兰芳、周信芳等名家，是京剧史上开办时间最长、培养人才

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京剧教育机构。

1935年，文人吴幻荪曾发表评论说：“富连成戏剧学社，就因为不追随时代潮流的推移，而反倒沾光了，因为一些举办不彻底改造的人士初次失败了，而且反连累他们剧艺不坚实，所以愈形映着，富连成戏剧学社，深具规范，注意剧艺。不过随于时代，反处处合于时代也。”

“富连成社始终坚持国剧的传统表演方法和程式，延续了国剧艺术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从而经受住了京剧市场的检验，获得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深圳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陈仕国指出，富连成社对传统表演方法和程式的坚持，反倒成了其在竞争中突围的筹码。

20世纪90年代初，舒桐曾在宁夏向出身富连成社的张元奎学戏。如今已是戏曲学院京剧系系主任的舒桐回忆起往事，仍然历历在目：“他的唱有着传统花脸的规范，要求学生吐字清晰，气口要求特别严格，能够缓气，不能够缓气的地方必须一口气呵成。音量要求从台口打到剧场最后一排。”

“几代京剧人的坚守和守护，使我们两百多年的京剧艺术传承至今。对于当代戏曲教

师来说，守正是我们在教学当中首先要把握的尺度。我们要把规范、严谨的戏曲艺术传承到下一代接班人的手中。”舒桐说。

如果说严谨、规范的动作是戏曲的“一字”，那么表演程式就是戏曲的“词句”。一篇文章写得再漂亮，遣词造句是否得当是关键。

1959年，富连成社弟子马连良对《赵氏孤儿》中程婴的角色进行了再创造。程婴是在赵家满门被害时充满紧张、肃穆、杀气腾腾的氛围中上场的。

“他冒着生命危险去赵家通风报信，在告别赵朔夫妇下场时，抖衣袖、甩髯口等一系列戏曲程式动作，不光体现了马连良自身扎实的基本功，也把人物叠足而立等内心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广东省文化馆研究馆员陈才说。

专家指出，程式化是戏曲的本体特征，也是戏曲塑造舞台形象的基本语汇，因此坚持程式化是戏曲发展、创新的前提。

“虽然‘程式’一词让人感觉在呈现上有所限制，实则可以在‘程式’中自由翱翔，展示出个人独特的魅力。”中国戏曲学院教师刘璐说。

然而，京剧是在农耕时代产生的，表演程

寻找「夏」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